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欧洲的觉醒

[英] 菲利普·沃尔夫 著

〔英〕 菲利浦·沃尔夫 著

商

各

503

5

商务印书馆

欧 洲 的 觉 醒

〔英〕 菲利普·沃尔夫 著

郑宇建 顾 蕊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1990年·北京

Philippe Wolff
THE AWAKENING OF EUROPE

根据英国企鹅出版社1985年版译出

ŌUZHŌU DE JUEXING

欧洲 的 觉 醒

〔英〕菲利普·沃尔夫 著

郑宇建 顾 犇 译

商 务 印 书 馆 出 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100710)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河北香河县第二印刷厂印刷

ISBN 7-100-00690-2/K·112

1990年8月第1版
1990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2,400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193千
印张8 1/8

定价：2.95 元

目 录

引言	1
第一部分 阿尔克温的时代	3
第一章 历史背景	4
第二章 古典文化的衰落	12
第三章 查理曼及其追随者	23
第四章 欧洲的文化基础	41
第五章 加洛林复兴的馈赠	56
第六章 断裂与缺陷	81
第七章 结论	90
第二部分 热尔贝的时代	93
第一章 基督再临的恐慌	96
第二章 历史背景：东方世界	102
第三章 历史背景：西方世界	117
第四章 加洛林复兴的遗产	131
第五章 热尔贝	148
第六章 结论	165
第三部分 阿培拉德的时代	167
第一章 西方的觉醒	170
第二章 文化的丰富	186
第三章 阿培拉德	213
第四章 阿培拉德的同时代人	235
第五章 结论	248

跋	250
译后记	254

引 言

本书并非是关于9世纪到12世纪这段时期的文学史、思想史甚或欧洲文化的完整的历史，尽管欧洲的文化事实上正诞生于这一时期。本书的目标虽仍不无雄心勃勃之嫌，但毕竟还是有分寸的。

首先，作者想考察一下历史与文化发展之间的关系。为此，我们必须简要地了解历史背景，特别是社会和经济条件的发展，以显示欧洲文化基础的进步，并指明这一总体的发展是如何导致相应文化的发展的。而且，我们还想知道，这一文化的热潮从什么时候开始，并以什么方式才不再流于学究式的空谈及矫揉造作，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考虑并试图解答现实问题，并从整体上影响历史的进程。

其次，一些杰出的天才人物因其有利的社会环境，对欧洲文化的兴起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此，作者也考察了他们的心理过程，勉强地充当了一个心理学家的角色。作者想借此抛砖引玉，希望心理学家能从此中发现合适的论题。

目前，不发达国家——或更乐观地称之为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问题，就可以促进这一方面的研究。查理曼时代的欧洲无疑是落后的，它需要大量外来的文化，就象祖先留下来的灿烂的文化遗产需要重新得到发现一样。当然，历史条件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应当慎重地应用比较历史学的方法。尽管如此，我们也不能提供任何简单的答案，只能强调在任何时期内一个特定文化的发展所产生的众多的复杂问题。只要这样，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由于篇幅的原因，大多数这样的论著只能指出几条可能的线索而不刻意深究，作者也不想在此枉费心机。在我们所考虑的近四个世纪中，作者选出了变革最多的三个时代，每个时代大约有50年。我们以各时代中最杰出人物的名字来命名这一时期，使这个人成为典型。这样，我们就可以着重考虑一些并不是这一时期内普遍的问题，而不用担心会造成假象。这些人物生平的一些细节也占了一定的篇幅，因为这有助于我们讨论当时的历史背景。

本书有一些事实未交代清楚而产生了使人困惑的空白点，这是作者的责任。还有一个使作者感到十分遗憾的疏忽，这就是关于艺术的发展史。其实，这也归因于作者在此方面知识的局限性。作者很想看到有一个在广大的艺术领域中的类似的研究，以补充本书的不足。

关于11世纪和12世纪，作者的老师马克·布洛克写道：

封建时代的艺术繁荣……经常是……一个避难所，因为人们没有别处可以实现自己的理想。在史诗中缺少的力，必须到罗马式建筑中去追求；法学家在文献中不能发现的理智的精确性，表现在拱廊的工艺上。

最后，人类的文明史是一个整体。作者所能作的只是一份微薄的贡献。

第 一 部 分

阿 尔 克 温 的 时 代

第一章 历史背景

公元780—781年冬日的一天，约克郡主教学院和图书院的院长，一位年近五十、以其虔诚和博学而蜚声于世的人物，踏上了横跨英吉利海峡的帆船。他的名字叫阿尔克温，他现在要作为新上任的约克郡大主教伊因保德的特使，代表他到罗马去接受教皇颁发的大披肩，这是种饰有十字字符的毛料祭服，是大主教职位的标志。阿尔克温已不是第一次来大陆了。他过去曾陪同前任大主教，他所崇敬的埃尔伯特，来罗马旅行过；另一次他溯莱茵河而上，沿途参观了那些最著名的城市 and 修道院，还会见了年轻的法兰克王查理，即后来的查理曼大帝，当时查理的辉煌事业已显端倪。

我们可以这样来描述他的旅行：这一小群人行色匆匆，在稀少而年久失修的大道上催赶着他们疲惫的马，每当夜色渐临就不得不早早地停歇。那时高卢最主要的港口是肯奇入口处的昆甸维克，肯奇离现在的小城艾塔普斯不远。这是个来自英格兰的教士、流浪者、商人的会聚通衢，这些人一般从哈斯廷地区的某处出发，他们都是高卢北部修道院的常客。过了此处，他们就分道扬镳了。

阿尔克温终于到达了罗马，在那儿逗留了几个星期。其间，他参加了教会的辩论，当然也参加了很多为提高罗马教廷声誉而举行的宗教活动。然后他便穿上伊因保德的大披肩启程回国。在罗马，他碰巧遇上了来罗马庆贺复活节的查理曼，当时是781年3月中旬。查理曼请求他在完成这次使命后再回来，帮助法兰克王国朝廷和教廷的教育和改革。现在看来阿尔克温在决定献身于一个具有光辉前景、对他又是全新的事业之前想必曾犹豫不决过。然

而，有两件事此时已削弱了他同故土的联系：一件是他热爱的埃尔伯特长老的去世，另一件是给诺森伯兰（约克郡是其首府）造成严重创伤的持续了好几年的战争。在这种情况下，他接受了邀请。

这对欧洲的文化史来说是决定性的一步。阿尔克温的贡献是我们现在称之为“加洛林复兴”背后的推动性精神。

查理曼给我们的第一个印象是一个征服者。每年春天，只要农作物有新的增长以保证兵员和马匹的足够供给，军队就会聚集于练兵场。这是国王发布所有重要政治决定的场合，接着大军在他的指挥下出发，在战役中度过夏天。他们秋天归来，人数自然少些，解散开来进入冬天的休养。就这样，这一君主统治模式几无变化地持续了47年，这期间人们早已不知什么才叫真正和平的时光了。连续的征战使得查理曼把已建立好的法兰克王国的疆域向四面八方扩展开去，这一王国是他从其父亲矮子丕平手中继承的。

在意大利，查理曼征服了那覆盖着半岛整个北部地区的伦巴第王国，把伦巴第国王的铁王冠戴在了自己的头上。他还将丕平早已转让给教皇的罗马公国和在那之前仍独立的两个伦巴第公爵领地（斯包利托和本尼凡托）沦为自己的多少令人讨厌的保护国。

但是对付日耳曼人他不得不集中全力。经过30多年艰苦的恶战和被征服者不断的可怕报复，他终于击败了大陆北部从爱姆斯到爱尔伯的异教的撒克逊人。那一直有迹象要挣脱法兰克束缚的巴伐利亚也随之不容分说地就范。这样，那想把日耳曼整个溶入文明世界的往日的罗马梦想——为追求这一梦想瓦鲁斯的古罗马军团曾全军覆没——终于在查理曼手里变成了现实，尽管这是由一个法兰克人、从而也算作是日耳曼人实现的。

查理曼并不是在所有地方都同样成功的。确实，在东南面他非常幸运地拿下了防守坚固的阿瓦斯环形区，把这里曾经烜赫一

时的亚细亚人的残存者纳入他的铁蹄之下，这些人散居在大部分现今属于匈牙利的土地上。但是穆斯林的西班牙却给他以重创。公元777年5月当一个有点奇怪的阿拉伯使团到达撒克逊心脏的佩达伯恩，请求他帮助消灭这一穆斯林行省的酋长时，他想必见到了把整个伊比利亚半岛从穆斯林的新月旗下解放出来的前景。可是到了萨拉哥萨城下，面对着紧闭着的城门时，他才痛苦地意识到他所依赖的力量的脆弱。更不幸的是，在隆西斯弗奥克斯，跨越比利牛斯山脉的归途中，他的军队遭到了惨败——其严重性不是当代的材料所能完全掩盖的，尽管后来在《罗兰之歌》里它得到了美化和颂扬。查理曼有理由对如下事实感到满足：他在埃伯拉和比利牛斯之间创造了一道防卫边界，这道边界在穆斯林军队的威胁下又整整延续了200年。

现在法兰克王查理曼几乎控制了整个西方基督教世界，除了不列颠岛是个例外，他没有希望征服它——虽然他一直保持着与莫西亚王奥发，一个最强有力的统治者的稳定关系。他在行动中打出的头衔显示了他权力的范围和种类：“荣膺上帝恩典的法兰克和伦巴第之王、罗马贵族查理。”也许他还加上了“西哥特（现在的加泰罗尼亚和巴斯·朗格多克）人的解放者。”这一几乎是世界性的权力使得他可与古罗马皇帝的权势相媲美，对于后者的统治权当时没有任何“蛮族”敢于僭越。事实上，这时占据着君士坦丁堡的拜占庭帝国皇位的是一位女性，名叫艾琳，她因为“那种性别所致的心灵的软弱和易变”实际上不能算作真正的皇帝。公元800年圣诞之夜，当查理曼在罗马的圣彼得教堂出席圣诞弥撒时，教皇把一顶金皇冠加于他的头上，在场的所有人都向他欢呼，“上帝加冕的奥古斯都、伟大而宽宏的罗马皇帝查理万岁！”

对一个法兰克人来说，要在西方复兴那曾被奥古斯都、图拉真、马可·奥勒留和康斯坦丁取得过的荣耀地位，无疑是一种新鲜

而大胆的举动。拜占庭人要么无视它的存在、要么藐视它。编年史家提奥芬斯嘲弄地把查理曼描绘为被教皇“从头到脚涂满了油”。更令人怀疑的是查理曼本人是否充分理解这个观念曾经代表过的意义。他以他自己的吃力而艰难的方式扮演着自康斯坦丁以来一直为人想望的基督教皇帝的角色，但是他没有能力摆脱掉法兰克宫廷瓜分遗产的习俗，他把他的财产在儿子们之间分配，好象他只是在处理一桩家族产业而不是一桩庞大帝国的基业。最后，纯粹偶然的机运使得他只有一个儿子比他活得更长，从而路易一世（虔诚者）继承了全部的帝业。尽管路易受过很好的教育，但是他很软弱，并深为强悍不羁的儿子们所苦恼，终于铸成大错。接着而来的争吵和分裂是导致加洛林王朝衰落的一个原因。

查理曼并未普遍地被人们列入历史伟人的行列。他的成功主要得力于他的个人勇气、他的军队的强大组织以及他的敌人的软弱和孤立，而不是任何战略上的天才。如果仔细考察他的战役，你还会发现他遭受过不止一次的失败。即使在他死之前，他那原有的几乎完全扎根于土地的力量，已经显露出在那些新起的、发源于海洋的敌人——诺曼人和撒拉逊人面前相形见绌的迹象来。在他死后，与这些敌人的战斗把这已经分裂的帝国的元气消耗殆尽。

尽管如此，这短短的充满胜利和好运的几十年所取得的成就也足以令人瞩目了。如果我们看一下加洛林王朝的版图，在我们心中立刻就会唤起一幅我们十分熟悉的图象。除了东部边界个别几处微小的差别外，它几乎就是现在的欧洲共同体的版图。在这幅图象上，尽管中间还有多种障碍，大不列颠已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接近欧洲了，与此同时西班牙的位置还不甚清楚。在中世纪加洛林王朝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旧结构，居然在 20 世纪中期作为一种建设新欧洲的实际有效的基础又一次出现，这决不可能完全是偶然的。

这是我们在文化领域内必须建立的联系。

在我们着手描述加洛林文化(它与阿尔克温的贡献密不可分)之前,必须先交待一下它的发展所从出的自然、经济和社会条件。

查理曼的荣耀不应该使我们忘记他所处的环境条件是极端原始的。查理曼的时代究竟算不算一个经济上进步的时代,这是学者们长期争论不休,而且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将争论不休的问题。确实有证据表明国王和一些大牧师对贵族阶层的劳作表现出一种新的兴趣(对于这种兴趣的了解我们得感谢现存的关于那个时期农村生活的文献资料);同样也有证据表明,军事上的征服(尤其是在撒克逊)是通向使荒野之地肥沃和兴盛的第一步,当时帝国简陋的道路整天忙着运送宫廷和军队急需的物资和食品。但是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在一个农业技术仍十分原始的世界中,任何这方面的改观都不可能很大。

就我们所能评价的有限的范围而言,农业收获之少真令人难以置信。凭着一种少有的好运气,有一份当时的财产清单保留至今,它记载的是关于一个坐落在法兰德斯和阿图瓦边界上的名叫安内普斯的皇室属地的情况。其谷类的收成竟不到种子数量的二倍。这也许是一个特别欠收的年头,但是,其它一些我们拥有的材料也表明这一地区的平均数为二比一左右。此外,谷类必须非常节省地播种,土地也必须周期性地休耕。在那些象巴黎盆地这样的土壤肥沃、精心耕作的地区,只要有好的天气条件,一年的休耕也就足以平补两年的种植了。在秋季种一类谷子(如作为人们主食的小麦,斯佩耳特小麦和黑麦),到春季再种另一类(如喂马的燕麦和大麦)。当气候条件不太有利时,或在那些全年气候都恶劣的地方,休耕就更加频繁。最后,在整个地区那种适应于暂时的、游牧式的耕作制度的习惯仍然存在着,而且常常是占主导地位的,这

一点很象今天那些不发达国家的情况。即先清除并圈上一块土地，在其上种一至两轮谷物，然后离开让它连续休闲数年。

从我们现在所了解的那个时代的农业方法来看，这么低的产量是可以理解的。相对说来牲畜数量很少，这意味着粪肥也很少，而有限的肥料一般也只专用于那环绕着贫穷居住地的庄园。金属农具更少得可怜。整个安内普斯属地一定极其大（因为它饲养着二百多头牛），可是总共才有两把长柄大镰刀、两把普通镰刀和两把铲子。查理曼时期的农民就是靠着木制工具从土地中艰难地谋取生计，这种工具的操作部分是在火中淬硬的。

很显然，这种工具只有在那些土壤特别适宜、排水良好并且土质松软挖起来不费劲的地方才能派用场。可这样的土壤并不是到处都有的。在别的地方，只有那配有犁铧和翻土犁板的坚固的轮式犁才能对付潮湿、厚实的地皮以及那稠密的野生草木，但这样的犁具是非常稀少的。因此，尽管这些是最肥的土地，它们仍然因为缺乏适当的工具而闲置着。即使在那些有可能耕种的地方，仍需要大量的劳力。设想一下用手工锄地，定期地用铲挖土以完成转型的工作，圈上已开垦的土地以及把收获的农作物运回家等等，需要花费多少人力！

因此，当有关那时的仅有的一些材料描绘出一幅人口分布极不均匀的景象时，就没有什么值得惊奇的了。公元820年左右为普雷的圣日耳曼修道院院长编制的一份关于其属地的财产清单表明，巴黎地区共有8个村庄，其居民的数量早已与18世纪中期同一地区的估计人口相差无几了。垦植最多的区域也就是人口最密的区域，因为要满足田间劳力的需求。但在英格兰、德意志甚至高卢本身，还有更多地区荒无人烟。但不管何处生活都同样是没有保障的：要么是一块地方人太多，要么是土地贫瘠难以耕种。

这些广袤的未开垦的土地，全都或多或少地保留着森林，这对

人们来说仍然是必不可少的，他们可以在其中找到填补他们匮乏的食物以及满足多种多样的需要。在森林中人们能采集到浆果和树上的水果，这些东西后来变成果园中专门种植的。他们还可把他们的家畜，尤其是猪，放到林中让其自由自在地觅食。他们打猎、捕鱼，砍伐为修房、生火、制工具用的木材，以及照明用的松脂和铺床用的欧洲蕨。所有的开垦过的田地周围必定都被这些荒野森林的环抱着，否则这里居民要想维持生活是不可想象的。

在这一大片人力尚未到达的地平面上——尽管人们付出了巨大势力的代价，获得了这点可怜的成果——自然不会有许多城镇。事实上，城镇在这里确实也没多大用处。在地中海地区以外，一个高度发达的农业体系和相对密集的贸易体系已经刺激起了城市的发展。真正的城市只有在那些具有政治和军事需要的地方才会发展，譬如沿着莱茵河的罗马帝国的边界区。

但是，此时城市已不再发挥罗马曾经赋予它们的行政和文明教化的职能，它们不再由罗马世界的频繁交通来支撑。甚至在欧洲南部，从3世纪开始，城市也由于旷日持久的战乱劫掠而不可挽回地衰落了。罗马的水渠在接连不断的各种围困袭击中已荡然无存，此时的罗马已成了她旧时的影子。但是这些带着供人凭吊的废墟的幽灵般的城市，屹立于那些悲惨的过度膨胀的村庄（它们在别处构成所谓的主教“城”）之旁，仍然留存着一种恢宏的气概，仍然是任何重要事件的理所当然的中心。在阿尔克温快要走完生命旅程之时，他发现图尔城“袅绕着青烟的屋顶狭小而且可鄙”，但至少主教有能力从他广大的领地获得养活几百个仆人和工匠所必需的给养。

因此，除了几条法规引起的立法方面的复杂情况外，查理曼社会的结构看上去十分简单。在它的底层是大量辛劳的民众，他们在土地上劳作，始终生活在饥饿线上。在他们当中有一小部分（或

许实际人数应比资料提示的多一些)理论上独立的土地所有者,他们须向教会和国家纳税。但在这广大的领土上、也居住着许多佃户,他们向其主人交各种各样的赋税并为耕耘主要的农田而提供劳动力,此外在农场里也驱使着一批奴隶。

在这些人之上有一个人数很少的大领主集团,他们关心的是上层事务,诸如祈祷、战争和行政管理。他们之所以人数很少是因为,不管广大的农民多么营养不足,总还有一些境况稍好的人,如果他们想幸存下去,特别是在一种奢侈的水准上维持他们的地位,就必须兼并和积累巨量的土地。这样最终跃居为大领主的只能是少数。布拉邦特的里欧-圣-皮埃尔的世俗领地占据了1.8万多公顷。普雷的圣日耳曼修道院拥有至少3.3万公顷,而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不仅控制了它直接隶属的领地,而且其土地散布在整个奥斯特拉西亚、阿基坦和普罗旺斯。当查理曼于公元774年夺取了伦巴第王国后,他又把加尔达湖上的西尔米奥岛和整个卡莫尼卡山谷赏赐给圣马丁修道院。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领主地产都象这么大,可查理曼的胜利允许他行使慷慨的赏赐,以增加他的追随者的财富和教会基金的数目。尽管如此,“加洛林复兴”也只能够影响一小部分人。

第二章 古典文化的衰落

大多数历史学家相信在加洛林时代确实发生过一场知识和文化的复兴运动，这种信念隐含着这样一个潜命题，即在这之前存在过一个文化沉寂或休眠的或长或短的阶段。曾一度庞大而辉煌的罗马帝国的覆灭，是如此地令人惊讶，它久久地激动和搅扰着历史学家的心。即使仅限于某一个方面，这个问题仍不减其巨大的质疑力。古代文化的衰落怎么会发生的，是什么原因引起的呢？

但是对加洛林复兴的确信并不意味着它的发生是突如其来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抬高查理曼而把他继位时面临的景象说得一团漆黑。相反，如果我们想发现隐藏于加洛林成就背后的东西，我们就应该仔细研究这些先前的事件——这是一个巨大的研究课题，必须限制在最根本的问题上。

古罗马的教育

在古罗马时代一点一点建立起来的教育体系的性质、形式和疏漏一直对欧洲的文化产生着一种持续的影响，因此这第一个主题值得我们特别的注意。

罗马的年轻学生一旦通过私人教师或地方学校掌握了阅读、写作和算术的初步的预备知识以后，他就在一个语法学家的指导下进行学习，但他的课程并不限于正确地学会母语。教科书一般列出关于语法、拼法和韵律学方面的规则系统以供参考。而且通过举例，在学习的过程中就已包含了许多对韵文和散文作品的分析，